

专论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

张秀明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北京 100007)

[关键词] 华侨研究; 海外侨情; 华人社会; 国际移民; 人口统计; 华人散居者

[摘要] 论文从华侨华人的口统计特征、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与认同的多元性、与祖籍国联系的密切以及在居住国地位的提高四个方面, 分析解读了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并就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提出几点思考。论文认为, 应该客观理性认识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要严格界定和区分“华侨”与“华人”的概念, 并且审慎思考“华侨华人”与“华人散居者”这一术语在英文语境中的接轨; 应该从国际移民视角审视和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和侨务工作, 消除偏见误解, 为中国移民正名, 为中国侨务工作正名。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21) 01-0001-16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Overseas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ZHANG Xiu-ming

(China Institute for Chineses Overseas Studies, Beijing 100007, China)

Key word: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ic statistics; Chinese Diaspora

Abstract: Focusing on demographic statistic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ir diverse identit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n host countries, this papers examines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in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contemplates the Chinese Diaspora studies in a post-epidemic era. It argues that the two terms “Chinese sojourners” and “ethnic Chinese”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pecially when the two are juxtaposed to the term “Chinese Diaspora” in an English-language context. Researchers in China may need to take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approach to look into and deal with the Chinese overseas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Doing so may rationalize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liminate racial prejudice against new Chinese migrants.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以后, 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 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 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平衡, 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 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 迈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

[收稿日期] 2020-05-11; [修回日期] 2020-12-18

[作者简介] 张秀明, 女,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移民与留学生、侨务政策、国际移民的比较研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的我国沿边地区侨情调研”(项目编号: 17@ZH008) 之阶段性成果。

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不少学者对海外侨情发生的新变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如李明欢从国际移民发展的大趋势来审视海外侨情发生的新变化；^[2] 庄国土对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与海外华商的发展进行了专门分析。^[3] 但是，学界对海外侨情发展变化进行整体分析的还不多。本文从华侨华人的口统计特征、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与认同的多元性、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及其在居住国的地位不断提高四个方面，详细解读 21 世纪以来海外侨情的变化，并对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进行思考。

作为一个由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庞大群体，华侨华人社会具有复杂性、多元性与变动性等特点，要全面把握其变化与特征比较困难。以下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

一、口统计特征的巨大变化

从口统计特征来看，华侨华人的口规模、来源地分布、居住地分布、国籍身份构成、性别构成、移民类型以及教育水平与职业流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口规模成倍增长

21 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口规模成倍增长，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翻了一番。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华侨华人规模为 3000 多万人；根据庄国土估算，2007—2008 年，华侨华人数超过了 4543 万人；^[4] 2014 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华侨华人数为 6000 多万人。^[5]

从主要国家来看，明显体现出中国移民人口大规模增长的趋势。以经合组织统计数据为例，无论是澳洲、欧洲还是美洲、亚洲，主要移民接受国的中国移民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其中，澳大利亚、英国的增长率超过 200%，新西兰、法国、西班牙、韩国超过 100%（详见表 1）。

表 1 2000—2017 年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国籍为中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流量统计

国家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2000 年	8055	4306	1811	14676	4822	18564	45585	36750	75281	64822
2017 年	29227	12200	4644	26590	11494	58000	71565	30280	109763	156848
增长比例（%）	263.46	183.32	156.43	81.18	138.37	212.43	56.99	-17.61	45.80	141.97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经合组织网站“国际移民数据库”数据整理，参见：“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https://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MIG&lang=en>，2020 年 5 月 20 日检索。

注：1. 经合组织对外国移民有不同口径、不同类别的统计。比如，按外国人口出生国统计、按外国人口国籍统计、按外国出生人口国籍进行流量和存量的统计等等。不同类别和口径的统计，其结果差距很大。而按外国出生人口国籍进行流量统计，数据相对完整。因此，本表列出按国籍进行统计的中国移民流量数据。

2. 原数据库包括 2000—2017 年每年的数据和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为避免繁复，本表只选取 2000 年和 2017 年两年的数据以及主要中国移民接受国的数据以反映中国移民的发展趋势。

3. 上述国家只有加拿大的数据呈减少的趋势，但这并不能说明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数量减少了，更有可能是入籍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在不断增长，而保留中国国籍的减少了。

华侨华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新移民群体的形成是重要原因。“新移民”，狭义上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大陆移民。广义上的“新移民”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移民国家相继进行移民政策改革后迁移的香港移民和台湾移民。^[6] 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1990 年，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为 410 万人，中国位列移民来源国第七位；2013 年，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增长到 930 万人，位列移民来源国第四位；2019 年，中国的国

际移民存量达 1070 万人，位列移民来源国第三位。^[7]新移民群体的形成不仅扩大了华侨华人社会的规模，而且为华侨华人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其格局和构成，是侨情发生变化的动因之一。

（二）来源地遍及全国各地

近代历史上，中国移民来源地以闽粤沿海地区为主，广东、福建成为海外移民众多、侨务资源丰富的第一、第二大侨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政策的日益宽松，一方面，广东人、福建人依靠原有的移民网络，重续海外移民之路；另一方面，随着国门的打开，全国各地民众通过留学、技术、投资、婚姻、务工等渠道走向国外，掀起了经久不衰的移民潮。海外移民现象不再局限于闽粤等地区，而是遍布全国各地。华侨华人的来源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据相关报道，广东籍华侨华人达 3000 多万人，分布在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8]福建籍华侨华人达 1580 万人，分布在世界 188 个国家和地区。^[9]除广东、福建这样的传统来源地外，其他省份也都有数量与规模不等的移民。以“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区市为例。2011 年上海市基本侨情调查结果显示，海外沪籍华侨华人、港澳居民和留学生共有 102 万人；2013 年浙江省侨情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有 202.04 万人；江苏籍海外侨胞^①100 多万人；江西籍海外侨胞 23 万人；安徽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45 万人；湖北籍华侨华人 60 多万人；湖南籍海外侨胞 50 多万人；重庆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30 多万人；四川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100 多万人；云南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250 多万人；贵州籍华侨华人 23 多万人。^[10]

可见，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省份，无论是传统侨乡还是没有移民传统的省份，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欠发达省份，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海外移民群体。

（三）地域分布更加广泛

以前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现在则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侨华人的分布越来越广泛，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每个角落。根据国务院侨办 2014 年公布的数据，华侨华人分布在 198 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东南亚、北美、澳洲等传统移居地华侨华人数量激增，非洲、拉美、欧洲等地中国移民也日益增多；移民目的地也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样吸引着中国移民的目光。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1990—2013 年，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移民居住地区发生了变化：1990 年，408.60 万名中国移民中，129.48 万人（32%）居住在较发达地区，279.12 万人（68%）居住在欠发达地区；2013 年，934.25 万中国移民中，504.16 万人（54%）居住在较发达地区，430.09 万人（46%）居住在欠发达的地区。^[11]

从地区和国家分布来看，有三个特点：一是东南亚仍然是华侨华人最大的聚居地，70% 以上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最高。根据庄国土教授的研究，迄 2007 年，东南亚华侨华人总数约 3348.6 万，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 73.5%，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12]二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数量激增。综合相关数据，美国超过 550 万、^[13]加拿大估计已超过 190 万；^[14]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 140 多万；^[15]欧洲估计有 250~300 万；^[16]日本中国籍人数达 117 万人，在韩国居留的中国人也超过 110 万人。^[17]三是遍布亚非拉地区。21 世纪以来，非洲华侨华人人数增长很快。根据各种估算，非洲华侨华人在 100 万人左右。^[18]拉美华侨华人由 1999 年的近 80 万人增长到 2014 年的 121 万人，如果再加上华裔，人数则超过 340 万人。^[19]21 世纪以来，中东的中国移民人数成倍增长。2002 年中东 14 国有 10 多万华侨华人，近几年总体规模已突破 50 万人。^[20]

（四）国籍身份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

华侨、华人作为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群体，虽然经常放在一起使用，但是，从法律上而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侨”是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而“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和“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21]前者是中国公民，后者是外国

① 各地概念表述不一，在此，笔者尊重原文表述。

公民。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二战后,特别是1955年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后,海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华侨,纷纷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为当地国公民,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虽然仍有一部分人保留中国国籍,但所占比例不大。此后几十年中,在当地国出生、成长的中国移民后代,一出生就是当地公民,而不是中国的“侨民”。改革开放后,虽然出现了新移民群体,但其规模只有1000多万人,而且这一群体并不都是“华侨”。几千万华侨华人中,大多数具有所在国国籍,是外籍华人,保留或持有中国国籍的华侨仅为十分之一左右。如2006年,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常驻各国的华侨有300多万名。^[22]2018年,国务院侨办在有关华侨权益保护的报告中指出,6000多万华侨华人中,华侨约600多万,外籍华人约5000多万。^[23]也就是说,90%为外籍华人,华侨只占10%。华侨华人的国籍身份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

(五) 性别构成上出现“女性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出现了“女性化”趋势。也就是说,从以男性移民为主,逐渐发展为男女性别比例基本趋于平衡的态势,甚至出现了在有些领域(如家政、护理)、有些国家(如菲律宾)和地区(亚洲)女性移民已经超过男性移民的现象。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报告,近年来,国际移民中女性占比近50%。如2015年、2019年,国际移民中52%为男性,48%为女性。^[24]

中国的新移民也具有相似的特点。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海外移民以男性为主,女性移民很少,华人社会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形成了著名的“单身汉社会”。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潮中,女性的存在越来越显著。她们不只是以“家属”等附属身份移居海外,更多的女性以独立移民的身份实现了跨国迁移,从而改变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性别构成。

虽然没有系统数据,但不少资料显示,华侨华人社会性别比已趋于平衡。在一些国家女性人数已经超过了男性。以美国为例,1990年,在美的中国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数量基本相当,分别为30.28万人和30.69万人;2013年,在美的中国男性移民为97.63万人,女性移民为127.05万人,性别比为77(100名女性对应77名男性)。^[25]再以新西兰为例,1991年,华人男女性别比例首次出现持平。之后,女性逐渐超过男性。21世纪以来,女性人数不断增加,远远超过男性。2006年新西兰华人的性别比为92,2013年性别比为89。^[26]

(六) 移民类型更加多元化

老一代移民以低技术劳工为主,而新移民的类型则日益多元化,涵盖了留学、技术、投资、家庭团聚、婚姻、劳务等国际移民的所有类型。

留学移民:留学热经久不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1978—2018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4.46%。^[27]

技术移民:由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调整吸引人才政策,加大吸纳技术移民的力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技术移民猛增。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内地取代中国香港成为加拿大技术移民的第一大来源地。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德国的中国移民约有15万人。其中,高达67.1%的人从事信息技术、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技术类工作。也就是说,德国的中国移民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技术移民,居各国移民之首。^[28]

投资移民:2008年以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许多国家将吸引优质移民作为提振本国经济、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措施,针对投资移民,普遍实施了较之以往更加积极和富有弹性的政策。中国的投资移民快速发展。据有关研究估计,2008—2014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五国是中国投资移民的主要目的国。五国的中国投资移民总数估计近10万人。^[29]近年来,英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拉脱维亚、匈牙利等多个欧洲国家放宽条件,鼓励和吸引投资移民,欧洲成为中国投资移民新的目的地。据报道,2012—2013年,英国投资移民人数为530人,

其中 171 人，也就是三分之一是中国人。^[30]

家庭团聚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移民国家，家庭团聚类移民一直占其吸纳移民的首位。这些国家的中国移民，家庭团聚类移民占比也很高。如 2010—2016 年，新西兰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中，家庭团聚类移民与商业 / 技术类移民分别为 37%，非配额式家庭团聚类移民占 24%，人道类移民占 2%。家庭团聚类移民占首位，其次是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与商业移民稳定增长。^[31]

婚姻移民：不少新移民，特别是女性，是通过婚姻方式移居国外的。比如，中国移民主要通过结婚、工作签证或留学 10 年三条途径入籍英国，人数各占约三分之一。而以配偶签证 2 年获得永居权的华人中，86% 是华人女性嫁到英国。^[32]

劳务移民：据商务部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 951.4 万人。2012 年以来，每年外派人数都在 50 万左右。^[33]

再移民：据康晓丽估计，二战后至 2014 年，东南亚地区华人海外移民总数在 345 万人左右。^[34]新西兰人口普查族群分类中，“华人”项下包括“柬埔寨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越南华人”“新加坡华人”等小类。^[35]再如，印度华人的再移民也很普遍。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政府的排华，再加上印度人口众多，失业率高，就业机会少，因此，不少印度华人纷纷移民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谋求发展。^[36]

（七）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与职业的向上流动

华侨华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甚至超过当地的平均水平，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首先是新移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即使从农村出国者大多也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次是通过留学而留居者更是高学历人才，技术移民，包括不少投资移民，也都是高层次人才。再次，由于华人重视教育，出生于当地的华裔教育水平更是普遍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例如，荷兰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与其他族裔及荷兰本土人士相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华裔第二代的比例高达 85%，而荷兰本土人这一比例只有 59%。^[37]再以美国为例，截止到 2019 年，美国的约 550 万华人中，54% 的成年华人有大学文凭，远高于美国 30% 的平均水平；移民美国的华人有 27% 拥有硕士学位，远高于其他国家移民 13% 左右的比例和美国当地人 12% 的比例。^[38]

教育水平与职业流动密切相关。随着华侨华人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其职业也越来越多元化，实现了向上的流动。以前老华侨主要是靠“三把刀”打天下，现在则有很大比例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以及企业家、科学家等。形象地比喻，就是实现了从“三刀”（菜刀、剪刀、剃刀）到“三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再到“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的飞跃。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中有 400 多万专业人才。^[39]以美国为例，51% 的华人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共约 300 余人，美国八大常春藤高校华人教授超过 320 余人；中国 985 高校毕业校友 20 多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40]再以意大利为例，2008—2013 年，意大利移民企业主占移民总数的 14.4%，而华人企业主占华人数量比例则高达 29.6%，也就是说，30% 的华人为企业主。^[41]

二、内部关系的变化：差异性显著与认同多元化

一方面，整体而言，华侨华人社会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不少新特点；另一方面，其内部的各种差异性也越来越显著。同时，内部的差异性也使华侨华人的认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一）内部的差异性日益显著

几千万华侨华人虽然具有相同的族群背景，但他们并不是一个高度同一性的群体，而是具有各种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越来越显著。而对于这种差异性，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居住国社会，认识都不足，都习惯把华侨华人社会看成是同质性社会，是“铁板一块”。

英国学者注意到了华人社会的这种巨大差异性。其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华人社会是高度多样化和急剧变迁的社会。由于在阶级、语言、来源地、移民时间、移民动因、代际、次群体等方面的差异而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个社会异质性很强,个人认同越来越混杂。然而,东道国的体制和社会科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他们仍被白人主流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政府政策几乎没有注意到华人社会中的代际变化和社会流动。^[42]

英国华人社会的这种差异性是整个华侨华人社会的缩影。这种差异性包括来源地差异、居住地差异、语言差异、阶层差异、代际差异、新老移民差异等多个方面。

一是来源地差异。如,大陆(内地)移民与港澳台移民在移民时间、移民类型、移民分布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大陆不同省份之间的移民也存在差异,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多为新移民,而且以高层次移民为主体;广东、福建等传统侨乡以家庭移民和连锁移民为主;浙江移民80%以上为新移民,80%分布在欧洲;东北地区的移民有不少是国企改革后的下岗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不再列举。

二是居住地差异。华侨华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移民政策、文化传统以及华侨华人的人数与规模等各不相同,身处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其生存发展状况与处境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异。比如,美、加、澳等移民国家,对移民接纳度高,移民政策比较开放包容,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面临更加宽松的环境,也比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沙特等中东国家移民与入籍政策比较严格,中国移民的入籍率很低,“华社三宝”——华人社团、华文报纸、华文学校比较缺乏;非洲以新移民为主,入籍率也很低。

三是语言差异。由于局限于华人社会的小圈子,不少华人既不会说中国的官方语言,也不会说当地的官方语言,而只会说祖籍地的地方方言。华侨华人“方言群”现象比较普遍。其中,粤语、闽南话等方言群规模庞大。如,加拿大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2015年,母语是普通话的人数从27万人增至64万人,普通话成为加拿大除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之外的第一大“其他语言”;讲粤语的人数则近60万人,位居第二。^[43]在世界各地,广府人集中的地方,粤语畅通无阻;而在闽南人聚集的地方,则闽南话盛行;在温州人、青田人众多的一些欧洲国家,温州话、青田话在华人社会内部是通行语。由于语言差异,一方面,不同方言群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存在着严重障碍,不利于华人社会内部的整合;另一方面,方言的通行与保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四是阶层差异。由于教育背景、从事职业等不同,华侨华人内部存在着显著的阶层差异,既有草根阶层,也有中产阶层以及精英阶层。而不同的阶层之间,其生存发展、处境与地位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阶层差异也逐渐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赵小建分析了二战后阶级观念在美国华人社会中的发展及其表现形式,认为随着美国华人社会的逐步多元化,华人的阶级观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而且对于阶级的认识更为复杂化;美国华人对于阶级的认同不仅取决于财富,还取决于家庭出身、移民背景、同化程度以及法律身份等多种因素。^[44]

五是代际差异。移民一代由于在中国出生成长,对中国的感情是天然的、割不断的;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华裔新生代则主要认同于当地,对中国的认知较少,对中国的情感比较疏远。此外,出生于当地的华裔教育水平、职业等普遍高于移民一代。如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华人移民已经培养出了教育水平高的下一代,后代能很快实现向上流动。这影响到了他们的认同,他们的国家认同与父母代截然不同。他们对英国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甚至要超过其族群认同。^[45]

六是新老移民差异。老移民由于迁移时间久,扎根当地程度深,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新移民由于移民时间短,不少人还处在立足创业阶段,再加上一些理念的不同,新老移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

总之,在共同的族群背景下,华侨华人社会内部具有诸多差异性,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图景,而

且这种差异性与复杂性越来越显著。因此，我们不应过多强调华侨华人社会的同一性，而忽视了这种差异性。

（二）认同的变迁与多元化

国际移民的认同问题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对祖籍国的认同，也包括对居住国的认同；不仅包括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也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多层面认同；不仅涉及自我认同，也涉及他者认同；等等。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同样如此，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并存、持续性与变动性交织等特点。

学界普遍认为，二战以前，海外华侨以认同中国为主，他们大多数人最终是要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二战以后，特别是1955年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以后，随着海外华侨大多选择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当地国公民，他们逐渐落地生根、融入当地，以认同居住国为主，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认同越来越多元化，既不完全落叶归根，也不完全是落地生根，而是出现了归化、跨国、循环、回归等多种形式并存的认同状态。归化当地者有之，落叶归根者有之，跨国流动者有之，更多的人则保持着双重甚至多重认同。

有些人选择了入籍归化当地，比如，北美和澳洲等移民国家华人的入籍率一直比较高。有些人选择放弃当地身份，回归中国。如2006—2016年，浙江省办理华侨定居落户8.7万余人、出国人员国外所生子女落户6.9万余人。^[46]2013—2018年5月，福建省办理华侨定居申请41477件。^[47]再如，著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姚期智等放弃了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有些人选择保留中国国籍，只申请当地永久居留权，如80%的浙江籍华侨并未选择入籍当地，而是申请永久居留权。有些人选择跨国流动，践行“跨国主义”，如2006—2012年，每年离开新西兰超过6个月的大陆移民占大陆移民批准总量的20%，台湾移民、香港移民这一比例分别为22%、20%。体现了华人移民的跨国性流动。^[48]有些华侨的生活中心转移到国内，长期“定居”国内而非国外。

华侨华人认同的这种变化及认同的日益多元化，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并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三、与祖籍国关系的变化：联系更加密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冷战格局和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中国的海外移民基本停止。1949—1979年，因私出国出境者只有21万人，主要是70年代初以后归侨侨眷出国出境探亲。再加上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的干扰与破坏，海外关系被视为“反动关系”，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基本中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侨务战线的拨乱反正，海外关系被视为“好关系”，是中国打开大门与世界交往的桥梁与纽带，华侨华人重新恢复了与祖籍国的各种联系。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各方面的联系与交往也日益密切，对祖籍国的认同不断增强。以下主要从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贡献、在祖籍国的政治参与、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社团网络的构建与强化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广东视察时指出，海外侨胞是中国的一个独特优势。改革开放有海外侨胞的一份功劳。^[49]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从吸收外资来看，根据笔者对有关数据的梳理，1979—2017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计超过90万家；累计利用外资额近2万亿美元。其中，海外华商（包括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中国的投资占有重要地位，华商投资一直占中国吸收外资的60%以上。^[50]海外华商不仅是中国吸收外资的主力军，也是率先在中国投资的先行者。当外商还在犹疑观望时，是海外华商果断回国（来华）投资，兴建了一大批外资企业，引进了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接受侨汇来看，中国的侨汇收入从1982年的6.16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674亿美元，增加了100多倍。侨汇是中国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侨汇收入

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达 7.56%，其中 1986 年达到了峰值 19.64%，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侨汇收入对缓解中国外汇短缺发挥的重要作用。^[51] 2005 年，中国接受海外汇款 236 亿美元，居接受汇款最多国家首位；2010 年以后，中国稳居第二大侨汇接受国地位。^[52]

从公益捐赠来看，自改革开放至 2017 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中国公益事业的捐赠累计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慈善捐赠呈现出捐赠热情和数额持续高涨、捐赠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对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捐助引人注目等特点。此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在中国公益事业领域也开了先河，在激发国内的公益意识方面起了先导与示范作用。^[53]

一方面，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机遇，其自身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实现了良性互动，互利共赢。比如，最早在中国投资的泰国华人企业正大集团，其官网介绍，“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企业，40 年来，正大集团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截至目前，正大集团在中国设立企业 600 多家，下属企业遍布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员工 9 万人，是中国外商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领域最多的跨国企业集团之一……”^[54]

（二）海外侨胞在祖籍国的政治参与

除了经济社会方面与祖籍国联系日益紧密外，海外侨胞在祖籍国的政治参与也越来越积极。中国政府也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参政议政渠道，发挥其建言献策的作用。

从政协层面来看，2001 年，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首次邀请海外华侨列席会议。从 2004 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始，扩大邀请范围，邀请华侨与华人代表共同列席政协会议。2001—2019 年，全国政协连续 19 年邀请海外侨胞列席全国政协大会，共邀请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 592 位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而且受邀的人数和涵盖的国家总体呈增长趋势。^[55] 地方政协开展邀请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的工作更早。1984 年，北京市政协邀请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开创了邀请侨胞列席政协会议的先例。较早开展这项工作的还有上海（1986 年）、海南（1988 年）。1984—2013 年，各地政协累计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参与政协活动 1620 余人次。^[56] 从人大层面来看，华侨参政议政也有新的突破。2014 年，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首次邀请在广东投资、工作、居住或祖籍广东的 10 名华侨列席，开创了华侨列席人大会议的先例。2020 年，浙江也首次邀请华侨列席省人大会议。除了参加例行的“两会”外，海外侨胞也被邀请参与一些大政方针的协商或一些特殊的政治活动。如从 2005 年起，全国政协每年都邀请列席过政协大会的海外侨胞回国考察。政府部门也邀请海外侨胞参加国庆观礼等重大的政治活动。

此外，自 2015 年以来，广东、福建、上海、湖北、浙江、海南以及南京、大连等省市相继颁布并实施《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其中涉及华侨的多项政治权利，包括结社权，参加地方人大选举、列席地方人大会议，参加基层组织选举，担任地方政协委员、列席地方政协会议，报考公务员，等等。

（三）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社团网络的构建与强化

21 世纪以来，侨情变化的另一个显著趋势是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华侨华人社团网络的构建与强化。华侨华人社团网络体现出世界性与地方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趋势。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强。由人数众多的广东、福建籍社团的联合，发展到很多省籍社团的联合。由最初多在东南亚各地举办活动，发展为回到祖籍地举办，特别是近些年来，经常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举办，体现出跨越地域的全球化特点。择其要者如下。

自 1991 年首届在新加坡举行至 2019 年，世界华商大会已经举办了 15 届，其中，第六届（2001 年）、第十三届（2013 年）分别在南京和成都举办，第十五届（2019 年）在伦敦举办。自 1981 年举办首届至 2019 年，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已先后在香港、曼谷、吉隆坡、新加坡、澳门、巴黎、广州、悉尼、武汉、奥克兰等地举办 20 届。自 2000 年举办首届至 2018 年，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先后在

新加坡、广东、香港、吉隆坡、雅加达、曼谷、澳门、悉尼和温哥华举行了九届。自 1994 年举办首届至 2018 年，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相继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南非、新加坡、中国、印尼等国家召开了九届大会。自 1999 年创办至 2019 年的 20 年间，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举办了十届。自 1998 年起，江苏开展了一年一度的“海外江苏之友”活动。

此外，还有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世界闽商大会、世界浙商大会、世界海商大会等以传统侨乡为联结纽带的华侨华人社团联谊网络。除了传统侨乡，内地不少省份以及北京等大都市也构建了以祖籍地为联结点的社团网络。如世界赣商大会、世界晋商大会、世界冀商大会、全球吉商大会、全球秦商大会、海外北京人联谊大会，等等。

四、与居住国关系的变化：地位不断提升

华侨华人不仅为祖籍国的革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同样为居住国的各方面发展贡献良多。然而，长期以来，他们的贡献不仅得不到居住国主流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反而在居住国遭遇了各种歧视、排斥与迫害。随着华侨华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社会地位不断改善和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审视华侨华人的地位和贡献。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政府层面为历史上的排华道歉

历史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曾在国家层面和法律层面进行排华。虽然后来相继废除了排华法，但一直没有就这种对华人的歧视与不公平公开道歉。进入 21 世纪以后，这些国家相继就历史上的排华向华人进行道歉。这是华人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2002 年 2 月 12 日，时任新西兰总理克拉克代表新西兰政府正式就征收人头税等不公平政策向华人道歉，并承认早期华人对新西兰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之后，政府又拨出 500 万元，设立“华人人头税遗产信托基金会”，资助新西兰华人历史研究、文化保护等工作。^[57]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先后为排华而道歉。2006 年 6 月 22 日，时任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就种族歧视性“人头税”和《排华法案》向华人道歉，加拿大政府还为健在的“人头税”受害者和其他受害者遗孀共约 400 人每人补偿 2 万加元。2014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排华政策正式道歉，并承诺设立“传承基金”，把相关历史及华侨华人的贡献写进教科书。2018 年 4 月 22 日，加拿大温哥华市市议会在位于唐人街的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特别会议，市长罗品信代表市府就该市歧视华人的历史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58]2011 年、2012 年，美国联邦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先后通过法案，为《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的法律向华人表示道歉。2017 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首次代表维州政府公开为“淘金”时期政府向华人征收“人头税”等不公平待遇道歉。^[59]

（二）参政意识不断增强

海外华人曾被视为“经济动物”和“沉默一族”，他们不关心政治，缺乏参政意识和参政热情，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不能很好地为自己发声。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地，特别是欧美国家华人的参政意识不断提升，参政纪录不断被刷新。华人参政有多种途径和方式，在此主要以参与选举为例进行分析。

有学者统计，自 1990 年美国出现华人参政热潮至 2016 年，有超过 100 名华人担任各级议员、大使、部门及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法官和军界将军等职务，并且刷新政坛高位的华人政治明星不断涌现，如骆家辉、赵小兰、朱棣文和李孟贤等。^[60]2020 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华裔杨安泽参加了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继邝友良参选美国总统 50 年后，美国再次出现竞选总统的华人。

加拿大华人的参政成绩也十分引人注目。据学者统计，1957—2011 年，通过选举成功担任加拿大联邦国会众议员的华人共有 31 人次，其中，2000 年以后当选的有 24 人次。^[61]华人被提名为联邦

国会众议员正式候选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2011 年有 23 名,2015 年有 27 名,2019 年则有 41 名华人被提名为正式候选人。其中,2019 年共有 8 人胜出,成功率达 20%。^[62]在地方层面,有近 50 位华人当选省、市议员、市长和教育局学务委员。此外,还有多名华人通过委任方式担任联邦政府官员,如第 26 届加拿大总督伍冰芝(1999—2005),联邦多元文化部部长陈卓愉(2004),联邦政府事务暨体育部部长庄文浩(2006),多元文化国会秘书、老年事务国务部长黄陈小萍(2008—2011)。^[63]2018 年 7 月,伍凤仪被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任命为加拿大小型企业及出口促进部部长。

欧洲华人参政也屡有突破。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华人参政意识的增强以及英国少数族裔参政环境的转变,华人参政不断有新突破。21 世纪初,有多位华人当选地方议员。2010 年以后,华人踊跃竞选国会议员。比如,2010 年、2015 年和 2019 年的英国下院议员竞选,分别有 8 位、11 位、9 位华人参加了竞选。在 2015 年的大选中,麦艾伦(Alan Mak)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实现了华人在英国参政的新突破。^[64]之后,在 2017 年和 2019 年的英国大选中,麦艾伦均成功连任国会议员。^[65]在 2019 年的英国大选中,工党候选人陈美丽(Sarah Owen)成为英国议会历史上首位女性华裔议员。在英国 2019 年的地方选举中,约有 70% 的英国华人参与选民登记。^[66]21 世纪以来,法国华人的参政热情同样不断高涨。2014 年华人参政成果显著,多名华人参选者成功当选市议员、区议员等职位。在 2017 年法国立法选举中,陈文雄当选法国首位华人国会议员,开创了华人参政的新纪录。自 2009 年以来,多名德国华人当选地方议员和外国人参事会议员。^[67]

大洋洲华人的参政成就同样突出。2000 年以来,有多位华人当选联邦和州两级议员,在市政厅一级政府中,有多位华人当选首府城市的市长。特别是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提升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华人的参政诉求和参政热情日益增强,华人选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华人占比较高的选区尤其如此。^[68]2019 年是澳大利亚选举年,参选的联盟党和工党都积极争取华人的支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开通微信公众号,并前往悉尼唐人街拜访,高度评价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自由党和工党两名华裔女候选人进行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中文大选辩论,最终联盟党廖婵娥胜出,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华人众议员,华人参政议政迈出可喜的一步。^[69]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西兰出现了华人国会议员和华人市长。近年来,新西兰华人参政议政热情不断高涨。2019 年,中国新移民洪承琛参选奥克兰市长,成为奥克兰历史上参选市长的首位华人移民。2019 年,在参与奥克兰地方选举的 17 名华人中,有 8 人成功当选市议员和地区议员。^[70]

(三) 华侨华人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近年来,不少国家重新审视华侨华人对当地的贡献,并且通过多种形式予以表彰和肯定。一是通过设立专门节日,肯定和表彰华人对当地所做的贡献。略举几例。2017 年 5 月 8 日,美国加州众议院全票通过决议案,将每年 5 月 10 日定为铁路华工纪念日。2019 年横跨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竣工 150 周年,旧金山市议会也通过提案,将每年的 5 月 10 日定为旧金山“铁路华工日”。2019 年 8 月 22 日,加州正式通过了设立“美国华裔日”的议案,这是专门为华裔美国人而设立的节日,旨在肯定华人对加州和美国的重要历史贡献。2019 年 6 月 19 日,纽约州参议院一致通过促进中美友好和肯定华裔贡献决议案,并将 2019 年 10 月 1 日设为“中国日”(China Day),将该月的第一周设为“华裔传统周”。2018 年,时任巴西总统特梅尔签署法令,正式将每年的 8 月 15 日设立为“中国移民日”,进一步彰显华人对巴西社会建设做出的贡献。

二是肯定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及其为中外友好所做的贡献。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自雇率和就业率普遍很高。以西班牙为例。西班牙中国移民的创业精神在所有外来移民中首屈一指,西班牙经济、就业和财政部部长恩格拉西亚·伊达尔戈赞扬,没有一个外来移民可以像中国移民那样,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积极去创业。2008 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后,西班牙华人经济逆势上扬。2008—2017 年,华人老板人数从 2.3 万人左右增长到了 5 万人左右,增长率为 110%。据西班牙统计局 2016 年的统计数据,参加社保的西班牙中国移民大约有 9.5 万人左右,占华人适龄劳动者人数的 95%。也就是说,

几乎所有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华人都在工作。^[71] 华侨华人对法国社会的贡献也得到了当地主流社会的肯定。2017 年中国新年,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盛赞华侨华人对法国社会发展、法中友谊与交往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并向 40 余位华侨华人和媒体代表颁发了参议院“法中友谊贡献纪念奖章”。^[72]

三是华侨华人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日益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肯定。大到诺贝尔奖, 小到当地社区的表彰, 华侨华人获得的大小、各种层面、各个领域的奖励与荣誉数不胜数。华人在科教领域的表现最为突出。美国有 8 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2020 年, 有 6 位华人科学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4—2019 年, 每年都有 30 名左右的华裔学生获得美国“总统学者奖”, 占获奖人数的 20% 左右。^[73] 2019 年, 3 位华人学者入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除了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外, 华人因为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也获得多种荣誉。以 2017 年为例。新西兰潮属总会会长张乙坤获新西兰荣誉国民英雄奖章; 巴西上海同乡会会长郑小云获得圣保罗州议会授勋; 刘明和刘立伟获得阿根廷国家移民局授予的“阿根廷杰出移民奖”; 巴西科学、艺术、历史和文学学院院士华人针灸医师宋南华获得该学院与巴西利亚联邦区议会联合授予的“荣誉勋章”; 阿根廷华人中医师钟清获得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颁发的“推广中医荣誉奖”。近年来, 有多名华侨华人获得以天皇之名、由日本政府颁发的绶章。^[74]

五、结语：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诸多变化, 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居住国因素、祖籍国因素、国际关系以及科技发展等工具性因素,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及其认同的选择, 影响着侨情的发展变化。如何应对侨情的重大变化, 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海外侨情出现的新情况与新挑战, 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与思考。

(一) 海外侨情变化的影响因素

1. 居住国因素

居住国的环境与政策, 特别是移民政策, 直接影响着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21 世纪以来, 欧美等地的移民政策在不断调整。美国 20 世纪后半叶推行的“融炉”“同化”政策失败, 东南亚不少国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也收效甚微。相反, 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包容性强的“多元文化”政策, 不仅强化了华侨华人对居住国的认同的, 同时也增强了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居住国政府与主流社会对华侨华人贡献和作用的肯定, 提高了他们对居住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认同。2016 年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不断收紧移民政策, 而近年来欧洲因为难民危机引发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困境, 这些都对华侨华人的处境与认同产生了新的影响。

2. 祖籍国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政策的限制、经济实力弱等原因, 出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是有海外关系者或少数留学精英才有的机会和权利。随着中国出入境政策越来越宽松, 出国的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 出国潮经久不衰, 形成了 1000 多万人的新移民群体, 也使海外侨情发生了诸多变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这些因素对海外侨情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密切合作、互利共赢对外关系格局的形成, 为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 中国的侨务政策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 密切了海外侨胞与祖籍国的感情, 增进了他们对祖籍国的各方面认同。

3. 工具性因素

交通、通讯等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对国际移民的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和新的社交媒体的发展重塑着国际移民的认同。华侨华人也不例外。一方面, 通过新媒体进行跨时空社区建构的便利性与低成本, 使得“天涯变咫尺”, 有利于他们保持与家人和祖籍国的各种联

系,产生了“网络民族主义”和“远程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华侨华人进一步融入居住国社会,强化了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华侨华人内部的联络与动员,有利于他们主动发声,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如2020年,面对特朗普发出的禁用微信的总统令,美国华人组织起来主动维权。他们成立了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拿起法律武器,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种现象越来越显著。

(二) 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的思考

面对海外侨情的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加强华侨华人研究,笔者在此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

1. 客观理性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当前,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种变局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也给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华侨华人不仅在生活与生产经营上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由于疫情的政治化和污名化,他们在当地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种族主义歧视与排斥,其生存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75]此外,中国的崛起使一些西方人在心理上不平衡、在心态上不甘心,纷纷举起了所谓“中国威胁”的大旗,“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不绝于耳。所谓“中国问题”成为一些国家政客履试不爽的拉拢选民和博取民众眼球的议题。而“中国移民威胁论”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变种。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强,这是开展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加以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严格界定和区分相关概念

应严格界定与区分“华侨”与“华人”的概念,并审慎思考“华侨华人”与“华人散居者”这一术语的接轨。虽然我们通常将“华侨华人”放在一起使用,但二者有严格的法律区别。如前所述,侨情变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华侨华人社会的国籍身份构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必须严格界定与区分二者之间的概念。然而,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和侨务工作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仍然较为混乱。鉴于华侨华人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以及政策法规的适用性,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认识和把握应该成为学术研究 with 开展侨务工作的“通识”。必须严格遵守“区别国籍界限”的原则,不应有意无意模糊华侨与外籍华人的国籍界限。^[76]此外,近年来,国际移民研究界对“diaspora”(散居者)这一术语的含义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这一最初专指犹太人离散者的术语,用来指称所有的国际移民及其后裔群体。国际移民组织与移民政策研究所关于“diaspora”的定义为:“散居者是指临时或者永久居住在其出生国或祖籍国之外,但仍然与来源国保持着情感和实质联系的移民及其后裔。”^[77]鉴于这一概念与“华侨华人”的概念高度吻合,可以考虑使用“华人散居者”这一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术语,特别是在英文语境里。当然,学界对“diaspora”的中译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海外移民”“海外侨民”“离散者”“流散族群”“散居者”等多种称谓。^[78]笔者认为“散居者”比较中性。

3. 从国际移民视角审视和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和侨务工作

应从国际移民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消除偏见误解,为中国移民正名,为中国侨务工作正名。对中国移民与中国侨务工作的偏见、误解甚至歪曲,比如“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政府索取论”“中国侨务干涉论”“海外华人不忠论”“海外华侨缺席论”等谬论应该给予澄清与纠正。

首先,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居住国的财富而非负担,更不是“威胁”。从移民人数来看,1000多万的中国海外移民,无论与全球国际移民总量(2.72亿)相比,还是与第一人口大国的14亿总人口以及中国国内每年2.5亿以上的国内人口流动相比,都是“细枝末流”。国际迁移并不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流,中国也从未将输出移民作为解决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途径。从移民性质来看,近代历史上,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殖民或日本政府支持日本人移民不同,历史上的中国移民既没有祖籍国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居住国政府的支持,反而还受到了种种歧视与排斥。他们在异域他乡靠自己的

勤劳和智慧艰苦拼搏,闯出了一番天地。中国的移民是和平移民,是经济移民。就当代来看,中国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了追求更好生活而移民,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难民,中国移民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是“模范少数民族”。从移民贡献来看,中国移民自雇水平高,中国移民通过“自我剥削”^①进行创业与发展。中餐、中医等中国传统文化丰富了当地的文化。中国移民为居住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以及中外友好交流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注重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作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的国际迁移现象越来越频繁,国际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移民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议题,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海外移民的作用。侨务机构和侨务工作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70多个国家都有侨务机构,都重视海外移民的工作,重视加强与海外移民的联系,注重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因此,中国政府将华侨华人视为中国发展的宝贵资源,从各方面加强与华侨华人的联系与合作,鼓励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不应受到“中国政府索取论”的指责。中国开展侨务工作的初衷,是“有利于海外侨胞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有利于发展我国同海外侨胞住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而不是所谓通过海外侨胞“干涉”别国内政,中国也从来没有这样做。“中国侨务干涉论”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别有用心地对中国侨务工作污名化。

第三,国际移民的认同本身就是复杂多元的,是“多元共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祖籍国的认同和情感并不意味着对居住国的“不忠”。对祖籍国的关注、认同以及情感维系,是国际移民群体普遍具有的现象,也是人类共有的情怀。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不应该继续遭受质疑。在人口国际迁移越来越普遍的时代,在双重国籍甚至多重国籍现象日益盛行的时代,不应该再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法看待国际移民的双重或多重认同。国际移民不仅是祖籍国也是居住国的财富。

最后,正确认识华侨华人的贡献与作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海外侨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独特作用。海外侨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没有“缺席”祖籍国的发展。然而,他们的贡献与作用还没有被社会各界广为认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居住在国外的不少侨胞选择回国避疫,由于有极个别人不遵守国内的防疫规定,引发了一些网民的渲染,最偏激的说法是“祖国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第一名”,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海外华人的负面形象。^[79]这种对海外侨胞的认知既不客观,也不公平。应该大力宣传海外侨胞的作用与贡献,使社会各界都能深入了解、客观评价他们的贡献与作用。另一方面,就居住国而言,虽然华侨华人对居住地的贡献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一定的认知与肯定,然而,他们仍然经常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歧视、排斥和不公平待遇。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遭到的种族主义歧视更是越来越多,成为被抹黑和“甩锅”的对象,其生存发展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困境,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与研究。

[注释]

- [1]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2] 李明欢:《国际移民大趋势与海外侨情新变化》,丘进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 [3] 庄国土:《21世纪前期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特点评析》,《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21世纪前期海外华商经济实力评估》,《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① 此处引用李明欢教授的观点。

- [4] 根据庄国土的研究,世界华侨华人总数超过 4500 万人。详见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 年第 5 期。
- [5] 详见新华网:“海外华人华侨有 6000 多万,分布在世界 198 个国家和地区”,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5/c_126225434.htm。
- [6] 参见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 [7] 详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译:《2013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福祉与发展》内部资料,第 196 页;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编译:《2020 世界移民报告》,内部资料,第 3 页。
- [8] 《南方日报》2017 年 5 月 11 日。
- [9] 东南网:“服务华侨来闽定居:福建省侨办简化落户手续”,http://www.fjsen.com/zhuant/2018-08/16/content_21372011.htm。
- [10] 张秀明:《侨务资源在“长江经济带”战略中的作用初探》,李其荣主编:《协同发展:华侨华人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10 页。
- [11] 中新网:“研究称全球移民人数创新高:中国移民 23 年增 500 万”,<http://www.chinanews.com/hr/2014/09-03/6558683.shtml>。
- [12] 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 [13] 参见搜狐网等多个社交媒体的报道,“真实数据告诉你:550 万华人在美国的现状”,https://www.sohu.com/a/398216994_559621;张春旺、张秀明主编:《世界侨情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65 页。
- [14] [62] 万晓宏:《2019 年加拿大联邦大选与华人参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
- [15] 张春旺、张秀明主编:《世界侨情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222 页。
- [16] 根据李明欢教授的介绍,一般认为,欧洲华侨华人在 250 万~300 万人之间,其最新专著采用 250 万的数据,参见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增订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年。
- [17] 张春旺、张秀明主编:《世界侨情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48 页。
- [18] 参见李安山:《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以非洲为例》,《西亚非洲》2016 年第 1 期;张春旺、张秀明主编:《世界侨情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203 页;等等。
- [19] 杨发金:《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
- [20] 张秀明:《中东地区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 [21] [76] 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 [22] 张秀明:《改革开放以来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23] 中国侨网:“国务院关于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全文)”,<http://www.chinaqw.com/sqfg/2018/04-26/187402.shtml>。
- [24] 详情参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编译:《2018 世界移民报告》,内部资料,第 24 页;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编译:《2020 世界移民报告》,内部资料,第 27 页。
- [25] 中新网:“研究称全球移民人数创新高:中国移民 23 年增 500 万”,<http://www.chinanews.com/hr/2014/09-03/6558683.shtml>。
- [26] [31][35][48][57] 杜继东主编:《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第 1 卷《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445、453、446~447、449、522~523、507~508 页。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18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3/t20190327_375704.html。
- [28] 《环球时报》2017 年 5 月 16 日,转引自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彭磷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编:《侨情综览》(2017),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01 页。
- [29]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国际移民现状与发展趋势”课题组课题报告:《中国海外投资移民与资金外流》,2014 年,内部资料。

- [30] 中新网:“教育环境吸睛 英国投资移民获签中国人一年增八成”,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4/02-11/5822075.shtml>。
- [32] 中新网:“去年逾 20 万外国人入英籍 华人入籍数连续 4 年下降”,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4/09-05/6565355.shtml>。
- [33] 搜狐网:“2019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运行现状,‘一带一路’带来重要战略机遇”, https://www.sohu.com/a/321156415_120113054。
- [34] 详见康晓丽:《二战后东南亚华人的海外移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69~214 页。
- [36] 张秀明:《被边缘化的群体:印度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
- [37] 中新网:“荷兰调查报告显示在荷兰裔学习和工作表现出色”,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1/08-20/3271530.shtml>。
- [38] 搜狐网:“550 万华人在美现状”, https://www.sohu.com/a/395910700_120518675。
- [39] 详见中国社会科学网:“国内首部《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蓝皮书出版”, http://news.cssn.cn/zx/zx_gjzh/zhnew/201408/t20140807_1283473.shtml。
- [40] 搜狐网:“550 万华人在美现状”, https://www.sohu.com/a/395910700_120518675。
- [41] 中新网:“意大利华人经济逆势增长 侨汇减少企业再投资增多”,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4/08-12/6483843.shtml>。
- [42] Gregor Benton, Edmund Terence Gomez,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Palgrave Macmillian, 2008, p.4.
- [43] [加]《星岛日报》2017 年 8 月 4 日,转引自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彭磷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编:《侨情综览》(2017),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18 页。
- [44] 赵小建:《美国华人社会的阶级研究——以个人访谈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 [45] Gregor Benton, Edmund Terence Gomez,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Palgrave Macmillian, 2008, pp.17-18.
- [46] 参考消息网:“浙江省调整浙商华侨、海外高层次人才等落户政策”, <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70125/1642984.shtml>。
- [47] 东南网:“服务华侨来闽定居:福建省侨办简化落户手续”, http://www.fjsen.com/zhuant/2018-08/16/content_21372011.htm。
- [49] 人民网:“关于改革开放 习近平广东之行释放了哪些新信息?”,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1026/c1001-30365379.html>。
- [50] 1979—2014 年数据引自[美]米高·恩莱特著,闫雪莲、张朝辉译:《助力中国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年,第 20~21 页;2015—2017 年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历年统计数据。
- [51] 林昌华:《改革开放以来侨汇收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启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 [52]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编译:《2020 世界移民报告》,内部资料,第 42 页。
- [53] 张秀明:《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对中国公益事业的贡献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 [54] 正大集团官网: <http://www.cpgroup.cn/column/84/>。
- [55] 张春旺、张秀明主编:《世界侨情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2~13 页。
- [56] 陈文良:《制度视角下的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机制:历史、现状与发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 [58] 参见人民网、中国日报网等报道,人民网:“不再受欺辱,华人路很长(侨界关注)”, <http://m.people.cn/n4/2018/0427/c1274-10893991.html>;中国日报网:“一场对华人的道歉:斗争百年,来之不易”,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8-04/25/content_36087193.htm。
- [59] 综合相关报道,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明出处。下面未注明出处的情况同此。
- [60] 金正昆、朱凌峰:《海外华人政治参与模式初探》,《东南亚研究》2016 年第 6 期。

- [61] 万晓宏:《当代加拿大华人参政分析》,《世界民族》2011年第4期。
- [63] 万晓宏:《当代加拿大华人参政分析》,《世界民族》2011年第4期。
- [64] 详见宋全成:《论21世纪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
- [65] 国懿、刘悦:《欧洲华人的参政现状与参政模式初探》,《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
- [66] 张春旺、张秀明主编:《世界侨情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49、154页。
- [67] 国懿、刘悦:《欧洲华人的参政现状与参政模式初探》,《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
- [68] 高佳:《澳洲华人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参政诉求:2007年大选以来的变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 [69] 张春旺、张秀明主编:《世界侨情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48~249页。
- [70] 张春旺、张秀明主编:《世界侨情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60~262页。
- [71] 中新网:“调查:西班牙中国移民逆势增长 华人再成‘明星’”,<http://www.chinanews.com/hr/2017/02-27/8160402.shtml>。
- [72] 国务院侨办网:“法前总理向华人、华媒颁奖章 赞华人对社会贡献”,<http://www.gqb.gov.cn/news/2017/0220/41844.shtml>。
- [73] 笔者根据相关报道统计。
- [74] 详见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彭磷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编:《侨情综览》(2017),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
- [75] 参见陈奕平、尹昭伊、关亦佳:《华侨华人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贡献、挑战与对策建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 [77] 定义来自2019年10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地理、环境与人口系在南京大学主办的“迁移、侨民和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的发言。
- [78] 有关讨论,参见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杨中举:《“Diaspora”的汉译问题及流散诗学话语建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张康:《离散华人族群与祖(籍)国关系变迁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温明明:《从离散到跨国散居——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等等。
- [79] 详见耿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人形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焕萍]